

魏瀚老師訪問記錄

受訪時間：2013年5月14日

受訪人：魏瀚老師

訪問人記錄：李蘭琪

受訪者大事記

| | |
|-------------|---|
| 學歷 | 1964年世界新專三專編採科第三屆畢業 美國夏威夷大學東西中心研究 |
| 經歷 | 曾任中央日報記者、編輯、編撰、編輯組副組長、組長、電腦中心主任、副總編輯、總編輯。中央日報海外版編務總監、中央日報網路版主編。僑委會網路報總編輯、僑委會宏觀周報總編輯、台灣立報社社長、副社長、顧問。 1996~2003 服務於中央日報 1991~2014 服務於台灣立報 |
| 專業服務 | 1980年，膺選該年度美國在台協會之「傑出新聞從業人員」，由美國國務院邀請，前往美國參觀考察美國新聞事業及新聞教育一個月，重點為美國報業電腦化發展過程及技術。 1984年，參加中央日報電腦化策進小組，規劃報紙電腦排版工作。1988年，出任中央日報電腦中心主任時，推出中文報紙電腦全頁組版系統，為海峽兩岸中文報紙第一家採用電腦全頁組版之報紙。 1992年至1997年，先後擔任台灣新生報、中華日報、台灣立報之報紙排版電腦化顧問，協助推廣電腦全頁排版工作。 1993年，協助世新大學新聞系「小世界」周刊，更換電腦排版系統。1996年，應北京大學邀請，前往該校附屬之「北大方正資訊公司」指導其「北大方正電腦排版系統」之程式修改及功能加強工作。 1997年起，引進「北大方正電腦組版系統」至中央日報、台灣立報、世新大學新聞系等單位使用。 2005年，參與規劃台灣立報更新電腦排版系統。 2001年起，主持或參與中央日報、台灣立報之網路報、電子報之規劃、上線工作。 |

個人生平經歷

我是世新三專編採科第三屆畢業（1961~1964），後來到美國夏威夷大學東西中心（East west center）去做短期進修，可是那並不是碩士學位，是因為美國國務院邀請我去進行考察研究。

畢業入社會工作後，大部分時間在中央日報服務，從記者、編輯一路做到總編輯，的確是一段相當長的歷程，十分艱辛。坦白說，因為我是世新畢業的，那時候報社內政大、台大畢業以及國外學成回來人的一大堆，幸好新聞工作是憑能力吃飯的，到最後要找適當的人擔任編輯部的主管不容易，有能力的人就會出頭，不論你是哪個學校畢業的。我做中央日報執行副總編輯很多年，熬了一段時間，才做到總編輯。總編輯卸任後，後來轉任海外版編務總監，中央日報海外版過去還蠻有名的，大家都知道，早年的留學生都看中央日報海外版。後來又中央日報又設網路版，網路版沒有設總編輯，只有主編，我就兼做網路版的主編；僑委會有個宏觀周報，有段時間曾經委託中央日報代編，也請我兼做總編輯。當然，我在台灣立報從做顧問到社長，也做了很多年。我在中央日報服務時間，大概有三十六、七年吧！1966(民國 55 年)到 2003 年，在立報是從 1991 年起做顧問直到現在。(註：已於 2014 年 7 月退休)

教學的資歷主要是世新跟文化大學，世新從民國 62 年開始任教，到現在沒有中斷，今年是民國 102 年，剛好是整整 40 年，文化大學也教了廿多年，在兩所大學所教的科目，早期曾教過「採訪寫作」，後來主要都是教「新聞編輯」。

追憶成舍我與世新求學時期

成舍我要求學生寫「雙週筭記」

談到世新和成舍我先生，第一個要提到的事，就是舍我先生早期要求學生寫「雙週筭記」，民國五十年九月，經過大專聯考，我來到翠谷，進到世新以後，印象深刻的事，就是成校長規定同學每兩個禮拜要寫一篇筭記，他要抽閱，沒有打分數，只寫個「閱」，簽了名就還給我們。那個時候導師、科主任，負責看同學們寫的筭記，不交的話要扣分的。老校長也會批示，批的話有時會罵人。有一次，編採科主任跟我說：「校長找你

啊！」，我說甚麼事，科主任說：「沒事啦，就是你寫的雙週筭記，有關批評學校的事。」我後來去見老校長，他說：「你的文筆不錯，你批評學校的事情，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，我想問問你家裡的情形。」

原來我父親跟舍老在大陸時期就認識，我父親也是從事新聞工作的，做過湖北中山日報社長，湖北省新聞處長，成都中央日報社長，民國三十八年，國民政府在大陸敗退的時候，我們全家隨政府從成都大撤退，坐飛機到海南島南邊的三亞港，再跑到北邊的海口市，到了海口市以後，想來台灣，卻沒有飛機了，只有登陸艦，男人可以上軍艦，女人小孩不能上軍艦，我父親怎麼可能把太太和三個小孩丟在海南島呢?!怎麼辦？只好花了不少錢買商船的船票，先跑到澳門，再轉往香港，輾轉來到台灣，我父親來台後，出任公職受了很多委屈，因為長官們認為他跑到香港去了一趟，心存觀望，對政府沒有信心，不忠貞，於是我父親就在國民黨中央黨部悶了很多年，做到祕書就退休了。

我講這段逃難經過，是和舍我先生有關的，因為就在我們全家在香港停留時，我父親在街頭碰到了成舍老，舍老說：「你要不要去台灣?」，我父親就說：「當然要去，我已經在申請入境證了。」談到台灣的安全問題，我父親說：「現在韓戰爆發，美國第七艦隊也協防台灣了，應該安全了。」舍老也說：「我也覺得長期待在香港不是辦法。」他表示也要去台灣。所以老校長和我談話時，他問到：「你父親是魏紹徵嗎？我們認識。」，我父親後來從國民黨中央黨部退休，還到世新兼了一段時間課，後來我的大哥魏鏞教授從交通大學退休，牟宗燦校長特別聘魏鏞到世新大學來擔任客座，可惜大哥身體不好，前幾年已經去世了，所以我們家跟世新頗有淵源，我父親、我哥哥、我，都在世新教過書。

憶世新師資與校友

很多世新的校友都強調世新早期聘請過很多名教授、名人啦、黨外的人啦，來學校教課，灌輸自由思想，我要強調的是甚麼呢？是品德的薰陶，比如說蔣勻田(民社黨)、沈雲龍(青年黨)、胡秋原、程滄波、費海璣（費海璣是殷海光的得意門生），陳少廷、教日文的吳盛木等，有的是反對黨，有的是有思想問題背景，後期的王曉波、黃煌雄、李筱峰等，都是反對國民黨政府的，一般校友常常強調上過這些老師的課，接受灌輸自由思想

啦、不畏強權啦，我認為除了這個之外，更值得強調的，是這些人大多一身傲骨，潔身自好，品德修養超人一等，因為你自己本身的品德操守如果有問題，怎麼「傲」得起來？「傲」就是因為自己品德操守很好，出淤泥於不染，國民黨抓不到你的毛病，所以這些人都強調品德修養，對年輕同學來說，這是一種人格、品德上的薰陶，這種道德上的潛移默化，對於世新的同學來說，是功不可沒的。

因為世新無形中培養了同學的品德修養，所以世新校友在新聞界這方面風評不錯，一方面很努力工作，一方面品德修養較好，很少有聽說有世新畢業的記者拿錢啦，貪汙啦這種事，其實早期的這些名教授或名人，他們除了傳播自由思想是很重要外，但我覺得品德修養、人格薰陶也是很重要的。

就新聞專業而言，坦白說，世新早期的專科教育是不夠的，「學然後知不足，用然後知不足」。那時候進修環境沒有現在方便，大家就想辦法自修，無論報紙、廣播或是電視、主流媒體對工作同仁當然有學歷方面的要求，學歷高低對升遷，還是有相當程度的影響，有些人繼續進修，獲得更高學歷之後，說不定就轉換到別的工作了，一般人若沒有進修，升遷就會受到影響，世新校友都很勤奮、很努力，各種媒體都很喜歡用世新的學生，但是能做到中級主管如組長、主任就不錯了、較少能做到最高主管層級，也就是做到總編輯、總經理的就少了，這就是說，你如果沒有取得更高學位的話，要做更高層主管就很難，後來進修的管道多了，有的人就去唸書，念碩士、博士。你只有不斷進修、不斷充實自己，才能跟得上時代的潮流。

早期世新的學生出到社會，都是自己闖天下，學校對他們的幫助有限，現在就不一樣啦，現在世新大學辦得有成效，有知名度，社會各界對世新大學有一定的評價，早年的時候，你常聽到別人說：「世新畢業的喔？專科學校嘛！」，不過世新的校友都很爭氣，新聞界的人都說：「世新畢業的學生很好用，苦幹實幹，不會好高騖遠」，這句好高騖遠的話，就是明指政大、台大的畢業生。

以我自己為例，最初我到中央日報地方新聞組當記者，也就是所謂的鄉鎮記者，在新店地區跑新聞，但是很快就因為表現不錯，一年多就調採訪組，到了採訪組以後，編輯部的長官就說：「採訪組二、三十個記者，

真正文筆好的不過那三、四個人而已，像蔡策、蘇玉珍、胡有瑞，魏瀚等，五個指頭就數得出來了。」，這種說法，對我是一種肯定，也是對世新的一種肯定，因為像蘇玉珍，是台大外文系的，胡有瑞是政大新聞系的，我是世新畢業的，說來說去，一句老話，新聞這個行業，是靠自己的實力吃飯，哪個學校畢業的並不重要，所以世新的校友多年來在新聞界，是以實力闖出名號。

舍我先生節儉有道

我又要談到一點，大家都認為老校長很節儉，甚至說他很小氣，這一點我不同意，中美斷交時，全國各界自動自發的發起募捐運動，支持政府，各大專院校也都有募捐活動，我們世新才募到 40 幾萬，老校長不滿意，他說：「你們這些人不愛國，捐了半天才捐 40 幾萬，別的學校都是 100 萬、150 萬…」，結果他下條子由學校貼了 50 幾萬元，湊足了 100 萬元捐給政府，大家都非常驚訝，想想董事長平常節儉的不得了，募捐這件事，通常是多捐少捐都可以，想不到他說太少了，貼了 50 幾萬元捐給政府，這事情我印象深刻，所以認為老校長雖然平時很節儉，但是該花的錢，他一點都不吝嗇，而且從這件事，也看得出他很愛國。

另外，我要講個小故事，我第一次幫老校長編小世界周刊，是民國六十幾年的事，那時候我在中央日報工作，抽空來學校幫老校長編小世界，編了一個多月，也不過四、五期吧，他給我一萬塊錢酬勞，那時候一萬塊錢很值錢，我說能追隨老校長編報，是我的榮幸，怎麼可以要酬勞呢？我說不要，他堅持要我收下，一定要看到我在單據上簽字才行，結果我把那一萬塊捐給圖書館買書，在圖書館服務的林達中收到這筆錢後，就打個電話給我：「魏老師，你的捐款要買甚麼書啊？」，我表示我沒有指定要買的書，我說：「這樣好了，圖書館缺什麼書，你就買什麼書。」，他說：「魏老師，我們很希望聽到這句話，因為過去圖書館買書，書單都要經過老校長親自看過，現在你說缺甚麼書就買甚麼書，那太好了，你要不要看書單呀？」，我說不用不用，結果林達中這位老兄也很絕，那一萬塊他全部買了言情小說，瓊瑤的小說啊！郭良蕙的書啊！一大堆都是這種書，每本書都還蓋上「魏瀚贈」，結果林達中還很得意告訴我說：「魏老師，你知道嗎？你捐的書借閱率最高。」我只能苦笑。

老校長的節儉，我在當學生時，就有親身的體驗，有一次我經過以前那個教室大樓的穿堂，老校長坐在一把椅子上，前面擺了一大堆掃把，一網一網的，做什麼事呢？原來總務處上簽呈，說全校的掃把用了兩三年要更新，也就是要買新掃把，他說我來看看，老校長要求總務處把所有要報廢的掃把都網起來，集中放在穿堂地上，他將一網網的掃把打開，一把一把拿來看，並交代總務組的人員：「這支還可以用！留下來，這隻不能用了，這隻還可以用…」，經過他篩選後，大概留了一半，省了一半的買掃把錢，這是我親眼看到的。

小世界周刊的編輯方針

舍我先生來台早期，為雷震、龔德柏這些在政治方面受迫害的人仗義執言，像龔德柏的案子，他在立法院質詢政府說：「不殺，不審，不放，你們到底要怎麼樣？」那時候敢對抗國民黨當局的人寥寥無幾。但是我的觀察是，舍我先生晚年時變得比較保守，立報後來被別人說是小型的中央日報，也說立報言論很保守，那時政治上已經解嚴了，各報都開始批評政府。老先生的轉變，有很長的一個過程，我那時幫他編小世界周刊時，他在立法院有特殊的消息管道，比如當時的總統嚴家淦（蔣中正去世後，副總統嚴家淦曾繼任總統）生病，那時總統生病不能隨便見報，雖說老總統蔣中正去世了，嚴家淦接任總統時間不長，但好歹他就是總統，嚴家淦生病住榮總，別的報一個字都沒有寫，小世界刊出新聞「嚴家淦微恙，住榮總」，總統府、新聞局、警備總部通通打電話來，說：「你們怎麼可以隨便登消息？」，老校長說：「嚴家淦就是在住院嘛！有甚麼不好登的？」，這些單位也無可奈何。

當時小世界的同仁用那個短波收音機，收聽倫敦 BBC、美國之音的國語廣播、莫斯科廣播電台等，當然包括大陸那邊的，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、福建前線人民廣播電台等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是播報中共中央的消息，福建前線廣播電台是專門對台灣廣播的，收聽這些電台，當時是被禁止的，那個時代收聽匪區廣播還得了？我們在小世界的辦公裡，公開收聽，我在幫老校長編小世界周刊時，家裡沒有短波收音機，那時候在台灣，短波收音機還被管制，不能隨便買，我叫我太太出國的時候，幫我買了一台很好的英國製的短波收音機，塞在衣服下面帶回來，這台短波收音機功能

很強，世界各地的電台都收聽得到，那時候收聽大陸中共廣播來改寫新聞，別的報紙都不敢做，只有小世界周刊這樣做。

可是後來我發現，對於新聞的處理，老校長自有分寸，他有時候說：「這個新聞最好不要登，那個消息可能引起困擾……。」老校長是反對台獨的，他也不喜歡黨外，他在世新任用老師，可以用異議人士，用黨外（後來的民進黨）的人，可是他在言論、國家立場上，是堅持中華民國的，他認為一個中國的立場不能動搖。老校長年紀大了以後，變得比較愛國，因為愛國、尊重國民黨政府，言論也就比以前保守。

舍我校長創辦世新與思想的轉變

這裡要談老校長當年如何創辦世新，其實就是國民黨的大老黃少谷一句話，黃少谷對老蔣總統說：「給那個成舍我辦個學校，讓他的精力有地方發洩，就不會寫文章罵人、罵政府了。」黃少谷那時候是老蔣面前的紅人，很掌權的，老蔣聽了黃少谷的話，就讓成舍我辦世界新聞職業學校，世新是這樣辦起來的，黃少谷為什麼替老校長講話呢？因為黃少谷年輕時是曾是老校長的部下，在北平世界日報做過編輯。

在戒嚴時期，世新校園也曾發生白色恐怖事件，像曾任編採科主任的程之行老師、教廣告學的朱傳譽老師，都曾被抓去坐牢，有的一兩年，有的三五年，過去談這種事是禁忌，解嚴以後，大家還是避諱談這些不愉快的往事。中廣公司有個名主持人崔小萍，也因為匪諜案，被抓去關了很多年，講到崔小萍，有個案子到現在為止，還是傳說紛紜，民國五十三年，有一次國內航線發生空難，在華航之前，只有一個民營航空公司，就是「中國民航空運公司」(CAT)，一架從台中飛台北的班機，在神岡上空爆炸墜毀，死了好多人，那時候香港電懋公司的老闆陸運濤夫婦（來台灣參加亞洲影展）、台灣省新聞處長吳紹燧夫婦、名製片人胡晉康、王植波、龍芳等，都死於這場空難，空難原因無定論，有一傳說，那架飛架被人放了炸彈，是一個陰謀，但查無實據，最後也就不了了之。

那個案子，地面上的人都說是空中爆炸，所以推測是飛機上被放了炸彈，有一說就是廣播公司的記者去採訪，採訪完把錄音機和錄音帶一起交給另外一個報社的記者，「請你帶回台北，交給公司」，聽說那個錄音機就

是一個炸彈，當然這只是傳說，沒有經過證實。

崔小萍被了關了好多年，一、二十年吧，後來出獄以後，還做過導播等工作。還有一個你們更覺得驚訝的，大華晚報的社長李荊蓀，新聞界的名人，也因為匪諜案被抓了，李荊蓀被抓的時候，連他的老師、新聞界的前輩馬星野先生，當時是擔任中央社董事長，都去保他，幫他說話：「李荊蓀怎麼可能是匪諜啊？」，要保他出來，調查局、警備總部就拿出李荊蓀和中共中央聯絡的資料，一大堆，馬星野看了一眼，馬上掉頭就走，因為證據確鑿嘛。

戒嚴時期，新聞界因為匪諜案風聲鶴唳，包括世新的程之行老師、朱傳譽老師都被抓，我認為這些案子對老校長的言論尺度有點影響，還是有些顧忌嘛！那後來等到解除戒嚴，報禁開放，已經解除戒嚴了，你應該不怕了吧，可是那時聯合報、中國時報言論尺度已經大為開放，一天到晚在批評政府，立報算是很節制的，而且那時候老校長很特別，對於政府的政策大部分是支持的，很少有批判；我覺得一個人年紀大了，會有轉變，年紀大了考慮就多，第二是老校長認為台灣不能亂，那時民進黨已經成立，台獨的問題也浮現了，加上我們退出聯合國、中美也斷交，一時人心惶惶，老校長有時會說：「台灣這樣亂還得了，那共產黨馬上就會打過來了，兩岸要統一，也是若干年後，現在人家大陸沒有要動武，我們自己亂成這個這樣，政府有些事情做得不好就改進嘛，怎麼可以像這樣動不動就上街頭鬧呢？」

舍我先生創辦台灣立報的歷程

我聽出來，老校長的想法和以前不太一樣了，覺得台灣很亂、要支持政府，於是立報在言論啦、編輯方針啦，各方面啦變得保守。保守也不是壞事，但是對於辦報來說，沒有加分，只有減分，所以立報剛開辦的時候，社會各界期望很高，都說：「舍老辦報啦！我們可以看看立報怎麼說！」等看了立報，啣？怎麼越看越像中央日報了，大家有點失望，聽說聯合報的老闆王惕吾、中國時報的老闆余紀忠，在立報創辦以後，看了沒多久以後表示「對我們不構成威脅」，我告訴你們，聯合報和中國時報老闆王惕吾和余紀忠，過去對舍我先生很恭敬，你看後來成嘉玲董事長對他們這些報老闆，都不假以辭色，為什麼？立報剛創辦時，聯合報和中國時報都抵

制立報，立報辦了以後，他們怕舍老辦的報紙壓倒聯合報、中國時報，第一個抵制，就是物流業者的發行系統，通通不讓他們送立報，報紙要搞發行，總要有送報系統、物流系統啊，這些大報的老闆對各地分銷處的人說，你要送立報，就不給你送中國時報、聯合報，這樣的抵制很厲害，搞得立報全省的發行一直弄不好，要另外找人送報，又不容易找到。

另外是廣告抵制，當時廣告商及傳播公司下各報廣告時，幾個大報也抵制，暗示他們不要下給立報，廣告商和傳播公司後來也發現，立報是個小型報，無法容納大型廣告，那時候的報紙，已經開發大型廣告，像房屋、汽車都是大版面廣告，全版、跨版，要不然就半版，立報是個小型報，大廣告都沒法吃下來，以前的廣告要用鉛字排的，後來都是美工完稿，都是電子檔案，廣告商或是傳播公司已經做好的一個大版廣告的電子檔，改小版很麻煩，你只能縮版，但縮了，小字又看不清楚，他也不可能為你一個立報，另外專門做一個小的四開版面的廣告，結果立報就拉不到廣告；發行做不好，廣告又拉不到、立報就起不來啦！

所以聯合、中時，都曾經抵制過立報，那時自由時報還叫自由日報，還不成氣候，中央日報沒有抵制，也沒有條件抵制，對於聯合報和中國時報抵制台灣立報，老校長也很生氣，你們去問問早期在報界的人，大概都知道這件事情。

老校長晚年時，終於解除戒嚴了，讓他一償辦報的宿願，其實在報禁未開放前，老校長也差點辦成了一個報紙，你們可能都不知道，過去台灣只有一家英文報紙，就是英文中國郵報 China post，後來新聞局奉指示，決定開放再辦一家英文報紙，這就是英文中國日報 China News 的由來，但是如果只准增辦英文報，不准辦中文報，怕外界會講話，於是就同時要開放辦一份中文報，也就是要多發兩張報紙的登記證，放眼台灣當時最有資格辦報的當屬成舍老，於是中央黨部負責文化宣傳工作的陶希聖先生，打了一個電話給舍老，要他趕快準備辦報，也就是準備讓成舍老的世界日報在台灣復刊，當時新的英文報，要給鄭南渭辦 China News，中文報就是給成舍我辦世界日報，可是這個案子送到那個老總統蔣介石面前，他一聽說成舍我要辦報，馬上就否決了，也許老總統對成舍老的辦報風格有所忌憚，他說，不能讓成舍我在台灣辦報，結果批示下來是，China News 可以辦，中文報的執照仍然不開放，這件事就胎死腹中，那個時候如果老校長辦報

辦成了，一定會成功，甚至超過聯合報、中國時報，因為那時報禁沒有開放，不會有一堆的競爭對手，等到民國七十七年報禁開放，哎呀！報紙一大堆，辦新報紙變成吃力不討好的事。

我後來有點難過的是，舍老高齡辦報，創辦立報後，他的健康情況開始走下坡，有一次他病了一段時間，住在新店花園新城，春節時我去拜年，師母韓鏡良老師在客廳接待我，她說老校長在裡面休息，我說那就不要打擾他，說我來過了就行了，老校長在房間裡面聽到我的聲音，就說：「魏瀚來了？叫他進來，叫他進來…」，我就進去了，他躺在床上，精神不太好，床邊有一個用藤條編的像個貝殼的小椅子，他說坐坐坐，我就坐在小椅子上，他說：「我年紀大了，精力不夠了，身體也不好，你說說看，這個立報為什麼辦不起來？別人都跟我說些好聽的話，你告訴我實話。」，我想了一會，也只好實話實說，我說：「校長，現在整個報業的生態跟以前不一樣了，現在的立報，言論各方面，批判性不夠，聯合報、中國時報不但內容煽色腥，罵人罵政府，也是毫不留情；第二個，報業市場已被壟斷，聯合、中時壟斷大部分報業市場，中央日報另有固定的財源和訂戶派銷，立報要打出一片天，不太容易，還有一點，你的小型報在大陸辦得成功，在台灣不好辦的原因是，受制於版面，拉不到大廣告。」老校長聽了半天沒有講話，後來他只承認一點，就是小報拉不到大廣告，他說，這個發行做不起來也很奇怪，明明可以做發行，銷路就是拉不起來，我說聯合報、中國時報抵制你嘛，對不對？他點點頭。我又說：「校長，你回想以前大陸時期辦報，那時候言論管制多嚴重？你冒著生命的危險，在軍閥時代，罵軍閥，在國民黨時代，罵國民黨，共產黨還沒有來，你就罵共產黨，這種報紙自然大家愛看」，他說現在政府做得不錯嘛，也沒甚麼好罵的，那時候是蔣經國時代，政治、經濟和國家建設都還不錯，不像現在亂糟糟的，老校長說，我們要言之有物，該罵的罵，不該罵的就不能隨便罵。

那次談話以後，我又到醫院看過他老人家一次，後來老校長就去世了。我對於那次在他花園新城的家裡，坐在他床邊和他談話，印象非常深刻。那天走出老校長的寓所時，韓老師還跟我講：「今天有七、八個人來拜年，都沒有進房裡去，只有你，老校長聽到你的聲音，就叫你進去了。」，我還致歉說：「對不起，我嗓門大，吵到老校長了。」，老校長對我是真的是特別好，我到現在還很感念。

關心世新同仁

老校長也很關心同仁的生活，我去幫他編小世界時，車子就停在新聞大樓的旁邊有個小停車場，那個小停車場有個鐵門，有一次編報編得很晚，工友走的時候，就把鐵門給鎖了，等到我編完報，因為鐵門已鎖，車子開不出去了，我只好叫計程車回家，第二天去編最後消息，和老校長聊天時順口提到：「我昨天編完小世界，回不了家。」，他說為什麼？我說車子被鎖在院子裡，老校長聽了，把那個工友罵了一頓，，他說：「人家編報這麼晚，很辛苦，你把鐵門鎖起來，人家車子開不出去，回不了家，你看到有車子在，鎖鐵門以前，至少要先打個招呼嘛！」我隨便一句話，害得工友挨罵，心裡有點過意不去，但從這件小事，顯示老校長很關心同仁的生活細節。

協助編輯《小世界》周報

舍我先生令人敬佩之處，是仔細又專業，我追隨他編報，自認已非常小心仔細，但是舍老用放大鏡看我編的版面大樣，仍可挑出毛病。他找我幫他編小世界的時候，我在中央日報編第一版，他見到我第一句話就說：「聽說你在中央日報編第一版？」，我說對。他說：「中央日報第一版不好編吧？」我說：「壓力很大」，那時蔣中正老總統還沒去世，天天有人讀報給他聽，首先就讀中央日報第一版，我當初被總編輯調去編第一版時，我父親都很反對，他說：「你不要去編那個第一版嘛！別的版面都可以，你幹嘛去編那個第一版，中央日報第一版出了錯，警備總部都會找你的。」，那時還沒解嚴，言論仍受管制，可是總編輯指定要我編，我也沒辦法拒絕，舍我先生對我說：「你能編中央日報第一版，那你就來幫忙我編小世界第一版」。

舍我先生那時眼睛不太好，小世界要人幫忙。別人幫他編，他有時不是很滿意，之前是荊溪人、黃仰山等，他們都是新聞界的前輩，也是編務老手，那時候的標題，都是梯型排列，主題對稱，兩行或三行，整組標題胖胖的，老校長下的標題最多兩行，而且長短不一，瘦瘦長長的，和一般報紙的標題不同，現在的報紙的標題，也流行這樣兩行或者一行，不一定

要對稱，很少見到胖胖的標題了。老校長做的標題，我一看就很明白，小世界是小型報，第一版沒有多大，要放很多新聞，如果都做胖胖的標題，非常佔版面，我就學老校長那種做標題的方式，前面一個肩題，後面一個主題；或是前面一個主題，後面一個子題，我做這種簡單式的標題，他看了很欣賞，覺得抓到他的精髓，當然在下標的文字運用上，我也十分用心，老校長很喜歡；我從哪裡知道他欣賞我呢？是他的司機告訴我的，有一次他的司機私下告訴我，老校長在車上跟他的太太聊天時說：「編來編去，只有魏瀚編得最好。」

從什麼地方看出創辦人的仔細呢？以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首領叫阿拉法特，有一則新聞，有四個地方提到阿拉法特，前面三個都是阿拉法特，最後一個寫成阿拿法特，音同字不同，我一眼看過去，沒有發現用字不同，卻被老校長看出來了，他說：「外國人的譯名要統一，不可以前後不一喲！」他連這個都看得出來，真令人佩服。他不僅僅是看標題，而且還看內文小字，老人家用個帶有手電筒的放大鏡看大樣，不放過任何一個細節，年紀那麼大了，還那麼敬業，要求那麼嚴格，我幫他老人家編報時真是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，承蒙他老人家認為我編報編得不錯，我真是受寵若驚。

那時候在小世界周刊工作的同仁有傅家齊、黃彬發、丁冠芬、張月娥等，現在只有一個丁冠芬還在學校服務，傅家齊傅老師在小世界時間最長，他也有一段故事很特別，他單身來台，在世新服務多年，他在台灣始終沒有結婚，等到政府開放大陸探親以後，他回到山東老家，他年輕時在大陸娶的太太也堅持未改嫁，白髮高齡的夫妻分別近半個世紀後，團圓重聚。開放探親後沒有幾年，傅老師葉落歸根，回到山東老家定居，跟他老妻又重建家庭。

協助成露茜社長辦《立報》

早期在立報服務的同仁有安強、賴明佶、盧幹金、黃仰山、徐君武、林熙治，有的是世新校友，有的不是，我對董事長唯一覺得虧欠他的，是當初他辦立報的時候希望我回來幫忙，給我的職務是總編輯，我那時候在中央日報是副總編輯，可是我當時沒有回立報，原因有兩個，第一個原因，中央日報規定同仁服務要滿 25 年才可以退休，才可以拿退休金，那時我的

年資是 22 年，這個時候如果離開中央日報，報社最多發給你三個月的慰問金，退休金全部泡湯，我太太極力反對，因為只差三年，就滿廿五年了，可以領退休金，現在離職，這廿幾年就白做了；第二個原因是那時候我身體不太好，是心臟方面的問題，因為壓力的關係，那時候常常到台大醫院去看醫生，經診斷後是心律不整，中央日報的工作做久了，壓力不大，如果回立報擔任總編輯，壓力一定很大，我怕身體無法負荷。

現任董事長成嘉玲，後來還對我說：「老校長辦報時找你來幫忙，你都不肯幫忙…」，我說不是不肯幫忙，中央日報年資未滿，自己身體也不好，的確有為難之處。那時候沒有回來，老校長有點失望，後來就找了安強、賴明佶等人。後來立報沒有辦起來，大家都意興闌珊，這些人也就先後退了。我要說句坦白話，我當時如果犧牲退休金，從中央日報離職，到立報來做總編輯，可能還是徒勞無功，因為我一個人的力量不可能把立報辦起來，台灣整個大環境已經和老校長當年在大陸辦報不同，當年別的報紙不敢講話，只有老校長的報紙敢講話，敢批評，世界日報、上海立報都能夠辦得起來，台灣開放報禁後，各報的言論都非常開放，非常尖銳，台灣立報沒有當年的時空背景，在各大報的夾縫中，很難辦出一個有特色的報紙。所以我真正對立報有點貢獻，是在後期的時候，老校長去世後，成露茜接辦立報，請我做顧問，幫忙立報搞電腦化，換系統，露茜社長不在台北時，請我代班，我襄助露茜社長做了一些事。

我在立報任顧問的那段時間，一方面在中央日報做副總編輯，後來做總編輯，而且還在兼課，但是每個禮拜都還來立報開社務會議，提了一些意見，也做了一些事。露茜社長有個性、有她的主觀看法，在立報工作過的人，有些人和她處不來，又離開了，但是她對我始終很好，所以我全力投入，我也不要多好的待遇，我最早是每月拿車馬費兩萬元，後來立報財務情況比較緊，我自動將車馬費降為一萬元，一萬塊扣掉訂報費，才九千多塊，我從未計較，露茜社長走了以後，我擔任副社長代理社長時，很長一段時間還是拿車馬費兩萬元，我對學校、對立報，始終是懷抱一種奉獻之心，舍我先生對我有知遇之恩，我應回報世新和成家，這是我今天還在立報服務最重要的原因。

這些年我看了很多世事的改變，人事的滄桑，我也不意名利，以我的年齡來說，應該退休了，至於還在立報工作，只能說是 Lucie 和成董事長

對我很好，這麼多年，我能幫忙就盡量幫忙，露茜去世那天，我趕到台大醫院，成嘉玲董事長見我第一句話：「魏瀚，Lucie 走了，立報你要幫忙看著。」我說：「好，董事長不用擔心。」，我義不容辭，毫無推託的餘地。談到這裡，我真的對露茜社長的去世感到難過和不捨，Lucie 一個人擔任那麼多工作，雖說她能者多勞，但是她的缺點就是事必躬親，我跟她說，有些事交給別人管，不要事事勞力煩心，舍我紀念館啦、傳播學院啦、台灣立報啦、傳記文學啦，社發基金會啦，一大堆事忙得要死，我和她說，妳專心管一兩個單位就好了嘛！她不行，她說她的個性就是這樣，很多事放不下心，結果身體都搞壞了，連養病時都沒有充分休息。

好啦，現在露茜真正擺脫了，一句話：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」。露茜社長去世後，成董事長對她留下的工作後，明快指示，舍我紀念館嘛，那個曉南啊，你管舍我紀念館，立報呢，魏瀚你來，社發基金會，就由曉鵬負責，傳記文學，找溫洽溢，工作一分派，大家都盡心盡力做事，每一個單位都運作得很順暢，董事長就輕鬆了。

我為何談這個呢？這也有一段閒話，這麼多年對世新也好、對立報也好，我是懷著一種回饋之心、奉獻的心，也有人說些風涼話：「唉喲！魏瀚，你熬出頭了，當立報社長了」，老實說，我從未想過要當立報社長，也不認為當立報社長有什麼了不起，我對外非常低調，報業公會、記者公會還是請陳秀鸞代表立報去參加，因為 Lucie 以前也是請陳秀鸞去，露茜社長去世時，陳秀鸞跟我說：「Lucie 走了，社長，那個報業公會和記者公會的理監事，你要不要自己做？」，我說還是請她做。我真的是來做事的，不是來做官的，現在學校經費很困難，面臨少子化的衝擊，下年度有沒有預算來辦立報都有問題，就只能硬著頭皮撐下去。

考進世新及初進職場的歷程

我在世新念書的時候，第一個學到的是自由的風氣，不畏強權，敢講話，我父親就跟說：「你的個性本來就有點叛逆，現在做了舍老的學生，將來進了新聞界，我有點為你耽心。」，後來我進了中央日報實習，最後留用。我們好幾個同學在中央日報實習，功課好的才能到大報去實習，我本來想去聯合報，但聯合報沒有去成，就去中央日報，在中央日報實習是很實在的，每天要交稿、寫日誌什麼的，我的稿子寫得不錯，曾受到誇獎，

最後當我們一個月實習結束的時候，當時的中央日報採訪主任汪有序就跟我說：「你如果當完兵不出國的話（因為我那時想去美國念書），可以來找我，但我沒有把握一定給你機會。」，我就記著這句話。

到我服完役，退伍以後，本來要想出國唸書，可我父母親年紀大了，我們家只有三兄弟，兩個哥哥都在美國，我一出國，家裡就沒有人照顧父母了，那時候我和父母住在一起，他們連換個電燈泡都要我來幫忙，一聽說我要出國，就說：「兩個哥哥暫時不能回來，你要出國，家裡誰來照顧呢？」，一方面這是個原因，一方面呢，老實說，我不是很愛念書，想到去美國深造，也有一點畏怯，我告訴你們啊，世新的學生很有意思，臥虎藏龍，真正喜歡念書的人，不太多，你看這世新校友不管是廣電啦、編採啦這些人啊，大部分人都很有才華，念書方面，大部分同學不是很喜歡念書，念書念的好的，功課好的人就到台大、政大去了，到世新來，大部分是考試分數不理想。

我告訴你們，大專聯考時，我的國文、三民主義都考得不錯，我數學考幾分呢？才四分，你都不相信吧？只有四分，一個科目只考四分，那總分怎麼高得起來呢，我的數學很差、三角幾何都不會，這四分怎麼得的？只畫了個幾何圖形，畫是畫對了，但是不會寫公式求證，閱卷者就給我四分，而且我告訴你一件好笑的事，我考數學的時候，題目難易都看不懂，那一年我能吊車尾考進世新，是因為那一年的數學特別難，數學好的考生沒有佔到便宜。

我印象很深，那年的數學就只有八題，我只看懂了一題，畫一個圖，我的一個高中同學，在考場坐在我的右前方，我看他考卷寫得滿滿的，我心裡想，唉喲！完了，他的數學也很爛，他寫得滿滿的，我都沒有寫，今年的數學應該是很容易吧？我都不會，等到一出教室以後，那些建中、附中的學生都說，今年數學題目好難哦！我就問我那個同學：「欸！你怎麼寫得滿滿地？」，他說：「我一題都不會，沒有辦法，每個題目抄了四遍，八題抄了三十二遍，然後最後寫了一句話，老師，請看在同情的份上，給我一點分數吧。」，但是拿到成績單時，他還是得零分，閱卷者一分都沒有給，我畫了個圖，給我四分。

我服完預備軍官役，暫時沒有出國計畫，我就去中央日報找汪有序，他那時他從採訪組主任改調地方組主任，他對我說：「我現在調單位了，

你進不了採訪組，我的職權範圍是在地方組。」我說，我不出國，是因為家裡有年長的父母要照顧，那能不能就在台北附近當記者，他說：「台北附近？新店有個老記者，表現不佳，我準備換掉他，也許這是個機會。」真的，那個人後來就去職了，我就去新店地區擔任地地方記者，後來表現不錯，調到採訪組當記者，一步一步這樣爬上來，怎麼進中央日報？就是實習留用，還是要感謝在世新，受到專業方面的培養，文筆的磨練等。

世新好多早期的校友都很傑出，你看那些在新聞界、影劇界、文藝界、廣電界，表現出色的非常多，當年在學校裡面就看出來，不少同學很傑出，臥虎藏龍，像陶曉清、林清玄等，廣電界、影劇圈就不用多說了，我在學校時也很出鋒頭，當選過全國青年代表，代表世新參加民國五十一年青年節籌備會，那不容易的，每個大專院校，只有一個代表，擔任全國青年代表很神氣，拜會各單位、到金門前線訪問，老總統蔣中正還接見，我真笨，那時候救國團的人說：「你是世新畢業的，那你就負責照相吧！」，我也喜歡照相，負責照相就照相了，總統召見的時候，一個勵志社的胡崇賢，一個我在照相，全體青年代表和總統合照，我自己卻沒有人鏡頭，有點遺憾。

在《中央日報》任職的回憶

在中央日報編第一版的時候，不但壓力很大，還要非常仔細，有一次，總統府發出總統文告要各報刊登，我在看稿的時候，養成一個好習慣，不管是誰的稿子，都會仔細看，總統府印得很漂亮的總統文告，我也是一個字一個字看，其實印好的總統文告，直接發排就可以了，我這個人也算龜毛，一字不漏的看，結果看到有個錯字，明顯的錯字，我跟總編輯講：「總統府發的總統文告有個錯字，你看看。」，總編輯說：「總統府發的稿子，他們自己看過多少遍了，錯字就給他錯吧！」，我聽到大吃一驚，我說：「這個怎麼可以呢？錯就讓它錯？明天登出來會鬧笑話的。」總編輯再看看那個錯字，也覺得的確有問題，後來叫採訪主任打個電話給總統府，那時已經晚上八、九點鐘了，總統府公關室只有值班人員，值班人員打到為總統代筆寫文告的先生的家裡，總統府的人對他說，有個中央日報的編輯說你寫的總統文告中有個錯字，那位著名的評論家倒還頗識大體，一問清楚後，馬上說「對對對，是個錯字，那要改！要改！要改！」，這下子鬧得

總統府人仰馬翻，第一個電話打到中央社，請中央社趕快更正，然後又分別打電話給各報社訂正，總統府公關室第二天曾打電話給中央日報致謝。

我擔任編輯組長時，有一天中央日報第一版出了個錯，排字房的那個拼版師傅被叫到警備總部，關了三天，還好後來還是被放出來了。那天的中央日報第一版的頭條新聞是「中央人事制度改革方案」，那時候還是鉛字排版，文稿排好後，校對也校過了，但是在拼板的時候，那一整塊頭條由檢排推車上，拿起來放到拼板檯時，噹！掉一個鉛字，拼版師傅就從地上撿起來一個字來放回去，可是地上鉛字很多，他撿錯了一個字，那個頭條新聞已經校對過了，就不再改了，而且拼好版看大樣時，編輯或者總編輯只看標題，內文小字很少再去看，當然標題是沒有錯的，小字有個字卻換掉了，第二天印出來的報紙，錯了甚麼字呢？「中央人事制度改革方案」，掉了一個「人」字到地上，撿起來的一個字，是個房間的「房」字，於是中央日報第二天的頭條新聞，一開頭就是「中央房事制度改革方案」，不得了，開了大玩笑，有關單位澈底調查，記者的原稿沒錯，他寫的是「中央人事制度改革方案」，校對的小樣也沒有錯，咦？怎麼印出來是錯的？問到那個拼版師傅，他說拼版的時候，掉了一個字在地上，就順手在地上撿了一個字放回去，警備總部的調查人員第一反應說：「匪諜！一定是匪諜！開玩笑嘛，哪個字不好撿，偏偏要撿這麼一個字。」警備總部把他叫去問話，而且講明了要準備換洗衣物，他老婆為他整理牙膏、牙刷、衣服，換洗用品都帶了，以為要關很久，還算運氣好，這個人的背景非常單純，從祖宗八代查起，也查不出一點毛病，問清楚後，關了三天才放出來，中央日報仍因他工作出了嚴重差錯，記了他一個大過，這類事情在中央日報，所在多有。

做為一個編輯，無論編哪一版，甚麼時候會出狀況，自己也不知道，當然，第一版是一個報紙的門面，是不能出錯的，你標題下得不好、或者是文稿有什麼問題，有時沒有收尾，或者有甚麼錯誤，別的版面比較無所謂，更正一下就是了，中央日報第一版，代表國民黨政府，所以編第一版風險較高。但是我也很坦白跟你們講，編第一版也是我在中央日報升遷的很重要的一個關鍵，做記者如果做得好的話，就可以說升副主任、主任、我很早就由記者轉任編輯的原因，是因為我太太也當中央日報記者，我們兩個人在同一單位，我跑黨政要聞、她跑外交新聞，不但在同一個辦公室上班，採訪主任還把我太太調到我對面坐，搞得我很不自在，那時候剛好

我開始在世新兼課，我就決定不做記者了，改做編輯，因為我在採訪組要升遷也很難，當了編輯以後，編過很多版面，像文教版啦、影劇版啦、財經版等，好多版面，後來因為表現不錯，總編輯就調我去編第一版，我本來也不想去，但是他叫你編你就得編，前一任的一版編輯調升為副主任，我編了若干年也是先升副主任，副主任做了幾年就升主任，再來就副總編輯；如果我沒有編第一版，我可能在各版轉來轉去，要升遷就恐怕很困難，編了一版以後，是對你的能力、工作表現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考驗，所以那個時候編過第一版，是我在中央日報能夠逐漸升遷的一個很重要的資歷。

我是世新校友第一個進中央日報的，可是後來世新的校友在中央日報工作的非常多，我為學弟學妹們開了一條路，甚至報社內別的學校畢業的同仁說，我們在搞甚麼世新幫，其實我從未有這個念頭要拉幫結派，那時候報社有位同仁陳正毅，也是世新畢業的，他說：「魏學長，我們組個中央日報世新校友會好不好？」，我就說不宜，別人會以為我們搞小圈圈，可是後來中央日報世新校友的確蠻多的。坦白說，新聞工作是憑實力吃飯的，過去曾經有個政工幹校畢業的人，他的父親是蔣經國面前的紅人，這個年輕人靠他老爸，被介紹到中央日報當記者，做了沒有幾個月，就做不下去了，老是被採訪主任罵，老是被編輯嫌寫的甚麼爛稿子，其實這位記者人不壞，可是實力不好，就算有老爸的背景也沒有用。

其實我在中央日報做得最成功的一項職務，是執行副總編輯，就是首席副總，為什麼自認為做總編輯不是很成功呢？很多因素，第一個，總編輯要對很多新聞作決策，用或是不用？要做多大的標題？佔多大的版面？除了新聞專業外，還有政治上的考量，也就是俗稱的報紙的立場，編輯的政策，甚到報社老闆的心態，都要有所掌握，這一點很難，也很煩，第二個，我做總編輯時的時空環境，有點複雜，那時候蔣經國剛去世，李登輝接任總統，後來又做國民黨主席，李登輝的言論主張，有些我不是很認同。

我還吃一個虧，是受我老哥的影響，我的大哥叫魏鏞，留美的政治學博士，學問不錯，做過行政院研考會主任委員，也做過立法委員。1990年，也就是民國七十九年，國民黨內部發生「二月政爭」，黨內分成所謂的主流派與非主流派，這個政爭發生在國民黨在中山樓召開的全會上，當時國民黨要推選下一任總統候選人，擁護李登輝的主流派，怕夜長夢多，主張

比照以前老蔣和小蔣的方式，用起立鼓掌方式來推舉候選人，非主流派人士認為，現在是什麼時代了，怎麼還要用以前那種威權時代，用起立鼓掌方式推舉候選人，應該要以投票方式，選出大家認為理想的人選，那時候李登輝在黨內不已經是那麼有人望，大家想把林洋港推出來，如果用票選的話，林洋港得票會壓倒李登輝，據了解，李登輝心裡有數，連退選聲明都已經寫好了，當時的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宋楚瑜，突然挺身發難，說我們黨內有一些人在搞陰謀，我們應該鞏固領導中心，大家不要搞票選，結果最後還是採鼓掌通過的方式，推舉李登輝為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，宋楚瑜繼蔣經國去世後的中常會上，臨門一腳，把李登輝推上黨主席的寶座，又在中山樓臨門一腳，保住了李登輝繼續當總統，但是後來李登輝卻翻臉不認人，因為怕宋楚瑜那個省長，光芒蓋過總統，而用精省、凍省來箝制他，兩人從此反目。

二月政爭之後，李登輝把黨內那些非主流派，恨之入骨，被列為非主流派者，包括什麼林洋港啦、蔣緯國啦、趙少康啦、張豫生啦，魏鏞啦，通通遭到秋後算帳，這件事也不能講太多了，不講了。反正後來李登輝聽說中央日報總編輯是魏鏞的弟弟，心裡也是不舒服的。老李的台獨思想早已顯現，我當總編輯時，李登輝在一個場合講了一句話：「經營大台灣，建立新中原」，當天為了中央日報第一版頭條新聞的標題怎麼做，我跟社長爭執了半天，我說：「經營大台灣」這個理念很好，可以強調，至於『建立新中原』，我認為有點小問題，俗話說：「群雄並起，逐鹿中原」，中原應該是講中國大陸，台灣這麼小的地方，建立什麼中原？建立新中原就有建立新國家的意思，所以我做的標題是：「李總統強調經營大台灣」，我們那個社長說，應改為「李總統強調建立新中原」，我對社長說，建立新中原不是隱含台獨思想嗎？他說：「魏瀚，你怎麼這麼笨呢？老李就是這個想法，你做建立新中原的標題，他就會很高興。」我忽然有個領悟，識時務者為俊傑，我就是不識時務，這個中央日報總編輯我是幹不長的，我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萌生退意，這個過去的事就不多談了。新聞專業有時候是行不通的，每個人也有每個人的政治理念，既然我的政治理念和當權者不同，就必須知所進退，這是我請辭中央日報總編輯的主要原因。

1984年參加中央日報電腦化策進小組

協助推動報社電腦化

談到個人的專業研究方面，第一個是1980年我應美國國務院邀請，以傑出新聞人員年度當選人，去美國研究考察一個月，全部由美國政府出錢，我那個時候是考察美國的新聞事業和新聞教育，重點就是報業電腦化。第二個是推動台灣的報業電腦化，台灣報紙實施電腦全頁組版，我是先驅者。後來各報請我當電腦顧問，協助他們進行電腦排版、學校方面像小世界、立報，更新電腦排版系統，我都出過力。

中央日報從鉛字排版到全面電腦化，我全部都參與了，過程長達十多年，民國七十年代，報業推動電腦化在初期遭遇很多困難，當年我在中央日報推動記者用電腦寫稿，就遇到很大的阻力，記者用筆寫稿成了習慣，不想學電腦輸入的人很多，我就想到在編輯部貼個大字報，就是一大排通過與沒有通過的名單，我們有一個電腦教室，隨時辦測試，通過的標準是每分鐘打三十五個字，這個標準現在看來不算高，當時大家覺非常難，通過的人就排在右邊，未通過的就排在左邊，這個名單不斷變動，左邊的名單越來越少，右邊的名單越來越多，很多編採同仁反對貼大字報，認為會造成同仁的壓力，有些人面子上掛不住，我跟當時的社長說，你不貼大字報，電腦化就推動不了，這個大字報對抵制和抗拒用電腦的人，造成很大的壓力，不過也的確收到效果，到後來未通過的人寥寥無幾，當然也有所謂的死硬派，就是不肯學電腦，也有少數人轉到其他單位，甚至辭職，但絕大多數的記者和編輯都學會用電腦輸入。

我後來又要求編輯自己用電腦組版，剛開始很困難，因為電腦組版的確很複雜，比電腦打稿難多了，組版的軟體有很多功能，要記住而能熟練操作，確實要花不少時間，但電腦化是時代潮流，台灣立報也是最早推行編輯自己組版的，根本沒有請過組版員，當年聯合報有相當長一段時間，一直有組版員，這些組版員原先大多是貼版的美工，後來改成電腦組版後，他們就轉任電腦組版員，他們為了保持工作權，怕編輯自己學會電腦組版，所以工會要求編輯不准碰滑鼠、不准碰鍵盤，他們怕編輯搶了他們的飯碗。我那時在中央日報推動電腦化，有人說我是Killer(殺手)，先「殺」掉那些排字工人，再「殺」電腦輸入員，再「殺」組版員，這裡說的「殺」，就是裁汰的意思，其實排字工人不是完全被裁退，學會電腦能轉電腦部門

的，就讓你轉業，別的報有的是全部不要，可是我給他們轉業。

民國 75 年到 77 年那段時間，各報起初都大量聘用輸入員打稿，打記者寫的稿子，報業電腦化的第一步工作，就是推動記者用電腦寫稿，等記者能用電腦寫稿後，各報的輸入員就大量的被裁退，只剩下幾個打字打得很快的。像立報，現在還有一個專業的輸入員，叫李美哎，她專門打字，有的主筆像蔡建仁的手寫稿，不幫他打不行，有的老先生寫的文章也要重新打字，有些文稿要轉檔，不好轉的就重新輸入。別的報社也是留少數幾個高手，打字快得不得了，其他的輸入員通通不要了。那時候報社的外地記者，也要學會用電腦寫稿，報社只收電腦稿，傳真和手寫稿不接受，有些記者年紀大了，學不會用電腦，每天用筆寫好稿後，叫自己的兒子、女兒幫忙用電腦打，打好再傳到報社。反正報社就只接受電子稿，不接受手寫稿。

報紙推動電腦化的第二個階段，就是推動編輯自己組版，我在中央日報那時候，專業的組版員一個晚上可以組三個版，晚上依時間先後，先組個地方新聞版、再組個體育版、影劇版，最後組第一版或第二版的要聞版，一個晚上組三個版面，待遇多少呢？那時就要兩萬五到三萬元，我推行電腦組版的時候跟社長說：「重賞之下必有勇夫，我們訂個規定，自己組版的編輯，每個月發五千塊組版津貼」，那時五千塊很多的，老闆說為何給那麼多錢？我告訴他：「一個組版員，一個月拿報社薪水兩萬五到三萬，她一個晚上只組三個版，我今天如果推動編輯自己組版，一個版面五千元，三個版面才一萬五，報社還是省錢啊！」，後來也就公布辦法，自己組版的編輯每月多發津貼五千元，大家紛紛學著自己組版。

編輯後來為何喜歡自己組版？一方面是可以多拿錢（五千塊那時候很值錢），第二是自己組版可以不受組版員的氣，因為一般編輯組版老是喜歡改來改去，組到一半又要重新組，組版員有些脾氣好的，還可以讓你改來改去，脾氣不好的，你剛剛組好一部份，又要重組，她就會不高興，有時改版面，又要換標題，不斷的弄來弄去，組版員就煩了，給你臉色看，講話口氣很壞，編輯和組版員之間甚至會吵起來。編輯自己組版，就可以不受組版員的氣，自己組版可以多拿錢，又可以不要受氣，大家更樂於自己組版。但是也有缺點，有些編輯動作慢，又喜歡改來改去，會耽誤時間，我當時有個規定，你這個版幾點鐘開始組的，基本上 40 分鐘要組好一個小

版，一個小時組好一個大版，不能拖拖拉拉像玩電動遊戲一樣，後來熟練以後，就越組越快了，半個鐘頭可以組好一個版。

中央日報推動編輯自己電腦組版後，記者用電腦打稿，編輯用電腦組版，甚至做點美工、校對也不用了，裁掉了一大堆人，連社長都把我叫去說：「你很積極，替報社省了不少的人事費，可是人家說你是 Killer，有人在質疑，報社到底要裁員裁到甚麼程度呢？連美編都可以裁嗎？」，我說：「沒錯啊，簡單的美工，編輯自己做，功力強的美編只留一兩個，像影劇版、副刊那些美工比較複雜的，用到美工軟體 Photoshop、coreldraw、Autocad、Pagemaker 較多的版面，專業的美編留一兩個人就好，其他的小的美工，編輯可以自己做。」，社長說：「那你的意思以後編輯部只剩那些人呢？」我說：「美國報紙的編輯部最後只剩兩種人，記者與編輯，其他的人可以省了，輸入員、組版員、校對、美編都可以逐漸淘汰，最後只剩下記者跟編輯。」

中央日報排除萬難，採用了電腦全頁組版系統後，聯合報邀請我去演講，除了編輯全部參加外，好多組版員都來了，編輯坐在前面，組版員坐在後面，在提問題時，後面的人問題比前面的多，後面的組版員問說：「編輯能夠自己組版嗎？」，我說當然可以自己組版，為什麼不能？他們說「編輯是文人啊，怎麼做技術工作？」我就說世新校長成舍我先生有個校訓：「德智兼修，手腦並用」，後一句話「手腦並用」，就是說新聞工作者要動腦也要動手，哪有編輯不能自己動手的？我說明美國的報紙，都是編輯自己組版，他們說「美國的報紙比較容易編啊，中文的報紙比較難」，我又解釋中文報紙組版並不難，現在中文報紙組版軟體的開發已經很成熟，學起來並不困難，而且時代潮流是報紙全面電腦化，強調編輯自己組版，勢在必行。

這次的演講和座談的結果，造成聯合報的一些困擾，他們報社的工會事後發表公開聲明，編輯不能自己組版，以保護組版員的工作權。那時候，中央日報的編輯有人跳槽到聯合報當編輯，這位小姐在中央日報都是自己用電腦組版，每個月都可以拿五千塊組版津貼，到了聯合報，待遇比中央日報好，卻不能自己組版，兩家報社用的同樣的系統，都是北大方正系統，但是這位編輯要自己使用電腦組版時，那個組版員說，我們工會有個規定，編輯不可以碰滑鼠，不可以碰鍵盤，你碰了就剝奪我們的工作權。有

一天那位編輯打電話給我說：「聯合報配給我的那個組版員，組版功力沒有我好，組版的基本巧都不太會，還要我教他，可是我就是不能碰電腦，不能組版，因為工會要保障他的工作權」。聯合報拖了好久，才把這個問題解決，中國時報也有過這類的問題。

自由時報改得最晚，自由時報老闆就是不肯改，咬著牙撐，別的報紙都採用了電腦全頁組版，自由時報還在貼版，每天晚上貼版員一大堆在那裡貼版，最後還是抵擋不住潮流的趨勢，同時人事包袱太重了，只好改電腦組版，因為採用電腦組版可以節省很多人事費，但拖的時間長達十幾年，中央日報是民國 77 年就電腦組版了，自由時報到民國 90 年有的版面還是用貼版的，至少晚了十幾年。

談各報電腦化的過程，也是顯示當初我們世新和小世界，乃至後來的立報，在排版電腦化方面，比很多報社做得更早，一方面舍我先生很有眼光，也很有魄力，為了推動電腦化，花了很多錢。

《小世界》周刊更換電腦排版系統過程

舍我先生用錢是用在刀口上，為了增添教學設備，常有大手筆的購置，當初《小世界》周刊從鉛字檢排，改用打字排版加照相打字標題，已花了不少錢，後來又捨棄打字排版，改買電腦排版系統，好像花了一兩百萬元，詳細的價格我不太記得了，那時買的是日本「寫研」公司產品，中央日報在推動電腦化初期，也差一點也買了「寫研」系統。

「寫研」是日本的排版公司，那種電腦排版不是自動化的，他們採用的系統叫 Offline，與 Online 系統有別，Offline 叫做離線系統，離線系統就是用磁碟片，抽出抽進，每個機器都是各自獨立的，這台機器是輸入的、那台是輸出的、這台機器是排版的，這種系統稱為 Offline；我推動的電腦化排版系統（指中央日報），是叫 System Online，所謂是連線系統，連線系統就是資料通通在一個伺服器上跑，在早期 PC 尚未流行，用 System Online 操作時，每部電腦都是 Work Station，即網路工作站，我們現在講網際網路叫 Internet，報社內部網路就是 Intranet，就是 Online 的系統，從輸入到改稿、組版、到輸出，文稿在一個系統上跑，這在現在不稀奇，早期硬體設備不

夠成熟，是很困難的。

早期使用 Online 系統，有很多 Bug 在，比如說裝置容量，就是個大問題，那時候一個大機器，裝不了太多東西，現在一個隨身碟的容量，就比當時的電腦主機容量還大。Offline 系統的好處就是分散儲存，這個機器輸入、這個機器組版、這個機器輸出，不必把資料都集中在一個主機上，如果不小心當機了，要當就當這一台，別的機器不受影響，如果這部輸入機當了沒關係，另外再找一台，因為它是分散儲存的；Online System 有個缺點，早期大主機或是伺服器裝置容量不夠，如果報社晚上稿子發太多時，就會禁止編輯濫發照片，因為照片的檔案很大，佔用很多磁碟空間，如果照片發太多，到了晚上組版時，整個系統就會慢下來，更嚴重的時候還會系統當機，大家的電腦都一片黑，過一會才恢復，當時多數報社採用雙主機，同時配用不斷電系統（UPS），當機時會自動切換；現在基本上是沒這問題了，Online 系統還有一個問題，就是不能感染病毒，系統中毒是不得了的大事，所以那時報社裡每個人的桌上型電腦的主機，磁碟片、光碟片的存放槽是封住的，不讓你自己帶磁碟片或光碟去，因為你的磁碟片、光碟片，如果帶了病毒就不得了，整個系統都有可能中毒。

舍我先生在創辦世新職校時，校訓就是：「德智兼修，手腦並用」，學校有自己的排字房，也就是鉛字排版，學生都要學會撿字，然後還要學拼版，《小世界》周刊最早都是用鉛字排版，先撿鉛字，再排版，再印刷，後來有了中文打字機後，就不撿鉛字了，就用中文打字機打排文稿，你們大概沒看過，一個很大的機器，放了很多鉛字，一個字一個字打，要用得熟練，必須記牢每個字的位置，《小世界》周刊以前有一個叫張月娥的小姐，打字打得最快，後來改用電腦排版，她很快就學會電腦打排，繼續在學校做了很久。

早期的電腦排版，中文打字機還要配用照相機打字機，文稿用中文打字機打完之後，另外有照相打字機專門打標題，照相機打字機是把不同的字體存在照相機裡面，級數大小就是用不同的鏡頭來控制，打字排版加上照相打字的標題，貼成一個版面，照相後再製版印刷，那時候已經覺得比鉛字排版又快又好。

我在「新聞編輯」這門課上課時，談到報紙的版面組成，拼版的過程分三種，立體、平面和影像，立體就是鉛字，平面就照相打字貼版，影像

就是現在的電腦組版，影像雖然是最新的，但有個缺點，就是電腦上的影像，都有如「鏡花水月」，在沒有列印或輸出前，都是影像而已，不像立體和平面的東西，那是實物，看得到拿得到；影像好是好，一旦當掉，而沒有儲存，就都不見了，這就是所謂鏡子裡的花，水中的月亮一般，都是幻影，這個觀念現在很多人忽視了，我還是會提醒報社同仁，要隨時儲存，要有備份，要防病毒，否則檔案一旦丟失了，有時是抓不回來的。

當年舍我先生買了照相打字標題跟打字排版設備以後，用了沒有多少年，老校長有次問我說，現在聽說有電腦排版，有哪些廠牌？我就說：「日本有兩個公司，一個是「寫研」，另一個是「森澤」，如果說哪個比較好？我認為寫研的比較好，因為他們造字造得很漂亮。」沒有多久，創辦人真的買了整套寫研的電腦排版系統。我剛聽說老校長買了寫研排版系統，有點意外，我跟他說：「幹嘛花那麼多錢買這個電腦系統來排小世界呢？」創辦人答覆是：「將來也可以用來作實習設備，學生可以學啊。」但是當時我還是認為，編個《小世界》周刊，不必花那麼多錢買整套的電腦排版系統，似乎是殺雞用牛刀，可是後來報禁開放，舍我先生辦了台灣立報，這套寫研系統就派上了用場，早期的立報全部用這個寫研系統排版，後來才換用北大方正系統。

1996 年應北京大學邀請

參與「北大方正組版系統」改版

中央日報最早的組版系統，用「棣南」的系統，後來改用北大方正系統，現在用 InDesign，從 CS2 開始，現在出到 CS6，不斷地更新版本，不斷往前推進。聯合報是第一家用電腦排版的報紙，那是民國 71 年，中央日報民國於 77 年首先推出電腦全頁組版的報紙，引起海峽兩岸報界的注意。

後來大陸北京大學邀我去他們的事業單位，也就是方正資訊公司，修改他們的「北大方正組版系統」，在北京停留了兩個禮拜，不斷跟他們上課和交換意見，兩個禮拜時間不夠，還沒有完全弄好，我因為工作職責的關係，就先回台灣，後來他們派了一個工程師到中央日報「駐社」，他們叫「蹲點」，搞了三個月，不斷的修改版本，並請我去看，他們的工程師

都是躲在中央日報電腦中心的一個小角落弄，我們的工程師或編輯過去看，會被拒絕，因為他怕洩露商業機密，只有我能看，後來版本改得不錯，中央日報、青年日報、立報、小世界，很多報紙都用北大方正組版系統。可是我們不會抱殘守缺，能跟得上潮流，慢慢地蘋果的麥金塔（Mac）系統的 InDesign 越來越好用，圖文整合的功能更強，北大方正系統就被取代了，各報紛紛改用 InDesign，小世界、立報也都改了，現在用北大方正組版系統的報紙很少了。

協助台灣《立報》更換電腦排版系統

當初成露茜擔任立報社長，請了兩個顧問，一個是立報的顧問，就是我，另一位是電腦顧問，就是聯合報的聯經資訊公司總經理那福忠。那時候，立報從寫研系統要更新用新的排版系統時，我們兩個顧問提出來的計畫書，都是主張用中國大陸的「北大方正系統」，但是露茜社長喜歡一個台灣本土公司叫做「指揮家」的電腦排版公司，老闆叫丘祺煌，他是從聯合報的聯經資訊公司出來，自己開公司。我與那福忠跟丘祺煌都很熟，指揮家排版系統是使用「旭青工作站」，功能是不錯的，它的排版系統，我和那福忠都去他們公司看了，我們對排版系統都很有了解，丘祺煌野心太大，他設計的排版系統可以排書、可以排雜誌、又可以排報紙，非常複雜，功能選項太多，游標點進點出，很花時間，用起來很不方便，不像北大方正系統就是專攻報紙組版。

我跟那福忠都建議用北大方正系統，但是露茜社長鍾意「指揮家」，認為公司就在台北市莊敬路這邊，隨時可以支援，而指揮家的老闆丘祺煌不像個生意人，是個書生，氣質談吐都不錯，露茜社長對他的印象很好，所以她想要選指揮家系統，偏偏我們兩個顧問主張選北大方正系統，露茜社長最後決定立報採雙線進行試用，「北大方正」系統的廠商拿了兩部組版機來試，指揮家搬來三部「旭青工作站」來組版，而且指派工程師在旁邊指導，晚上立報編輯同仁就用這五部組版機分別組版，組了不到一個禮拜，大家都不要用「指揮家」組版機，通通擠到「北大方正」這兩部電腦前組版，認為這個系統好用，較為方便，較為快速。

有一天晚上，露茜社長打電話給我，「魏瀚，你和方正資訊公司的總經理趙仁蓉聯絡一下，請趙老師明天送十部組版機來，錢現在不能給，學

校的預算，要到下個學期才給」，我第二天就打電話給方正資訊公司總經理趙仁蓉，「趙老師，請妳馬上送十部組版機來，錢要下個學期才能付」，結果第二天，十部組版機馬上就送到立報來了，編輯全部都用「北大方正」系統組版，「指揮家」就只好撤退，但是那三部「旭青工作站」是價購的，也就是先付了錢，相當貴，後來就做伺服器用。這是台灣立報換用組版系統的經過，很有意思。

談記者的文字能力

現在的時空背景，媒體生態發生了基本的變化，你看網路這麼盛行，即時新聞就像那種速食，麥當勞、肯德基一樣，看過就算，不求品質，這種速食文化的新聞，文字的修養已經不是很重要了，只要不寫錯字，不要鬧笑話就好了，但是仔細看報紙的人仍可看出記者或編輯文筆的好壞，無論紙本或是網路，文字的深度還是要講究的，像一般報紙的社論，必須言之有物，內容精闢，像立報有一個言論版，很受歡迎，因為我們請了很多好的寫手寫社論和短評，像蔡建仁老師的文章寫得不錯，林深靖寫的國際問題專欄很有深度，我們那些專欄作家的文章真的不錯。記者呢，大部分是剛畢業的學生，能夠寫得通順就不錯了，現在的記者，還花很多時間在文字的修飾方面不多了。都寫些有現成模式的套裝新聞稿，現在都是直接寫新聞稿稿就好啦，不求文字修飾，所以現在的報業，的確面臨很大的危機，社會流行速食文化，上網看消息、看電視新聞，智慧型手機、平板電腦這些行動裝置很方便，問學生說你多久看一次報？一個禮拜看一次已經不錯了，一個月看一次報的也不少，報紙的內容呢？就不能談了。

有些老先生看報覺得慘不忍睹，他說：「現在的記者都寫些甚麼東西嘛！錯字連篇，文句也不通。」，年輕人不在意，看得懂就好了，錯個字有什麼關係，那個注音符號，音同字不同，看過就算了，只要看得懂就行了。所以這些影劇新聞、體育新聞，都是在套公式，用很多年輕人的火星語言，網路流傳的俗話啦、外來語啦、一大堆東西，我看得不太順眼，可是它變成一個時尚，大家都像這樣的方式寫稿，不接受也不行。

我現在上課教學的時候，也是要求同學寫稿應求文字簡潔，當然還是提醒不要出錯，上個禮拜在課堂上做的演練，就是改稿，我先說明，這條稿子裡面有很多錯誤，你要把錯誤找出來，錯字、別字、重疊、顛倒，這

些錯誤，你至少要能看出來，編輯要會改稿，是基本要求，雖然時代不同了，時空環境變了以後，新聞寫作也好、報業生態也好、網路的盛行的影響等等，都屬於新聞專業的領域，仍然有它的基本法則。我在立報和同仁聊天時說，我雖然年紀大一點，但是我始終跟得上潮流，我天天上網看新聞的相關資料，美國報業生態的轉變、現在的報業是面臨甚麼樣轉型的狀況、紐約時報發展網路的成效如何…有很多資料我都去找來看，至少我在學校上課，避免被學生問個問題就把你問倒了。現在比如說世新大學的經費要作有效運用，我們立報可能要面臨怎麼樣的轉型，我都要有心理準備，也要有點計畫。

世新自由的校風與辦學有成

世新從一個職業學校，辦到今天這個成果，老校長的精神，也就是舍我先生的精神，始終能貫徹下來，他雖然已經走了，可是不管是成董事長也好、Lucie 也好；學校的老師、同仁也好，一代一代接棒的人，都還是秉持老校長的那種獨立的精神、執著的精神，校園的自由風氣始終還能維持。

我再講一個例子，那個賴幸媛，曾任立委員、陸委會的主委，現在駐歐盟的代表，她在世新念書時，參加「新聞人」社團，她寫社論時，文字就十分潑辣，她後來加入台聯黨。有件事很有意思，有一年，賴幸媛代表台聯黨要選不分區立法委員，那時候立委選舉是兩票制，一票投候選人，一票投政黨，世新剛好開校友會大會，賴幸媛來了，她見到我就說：「魏老師，這些校友你大部分都認識，我很多都不認識，你能不能陪我去每一桌敬酒？」，我說：「賴幸媛，你是台聯黨，我是國民黨耶，我怎麼介紹妳呢？」，「魏老師，拜託你啦……」，好啦好啦，我還是帶她每一桌去敬酒，「她是賴幸媛，人不錯，你們投票的時候，候選人這一票，你們選自己喜歡的人，政黨這一票，因為賴幸媛不錯，就請你們投台聯黨一票，讓她能夠進到立法院，好不好？」我還開玩笑地說：「不是我支持台聯黨喔！我支持賴幸媛，賴幸媛是傑出校友，你們投台聯黨一票，她就有希望進立法院。」，結果那次台聯黨得票太少，沒有達到基本門檻，不分區立委沒有選上。

當時還有校友跟我講：「魏老師，你不應該為賴幸媛拉票，她的政治理念很偏頗。」，我說：「賴幸媛的個性你們不了解，她只是一個反對當權

者的人，她不是甚麼的真正的台獨。」，果然後來馬英九找她去當陸委會主委，現在她是我國駐歐盟的代表。

世新就是有這種校園的自由風氣，開放的思想、從老校長一直到現在，世新校園的風氣是開放的、是自由的，這個是一種傳統，我覺得這一點，是值得每一個校友和在校學生珍惜。

談到世新大學近一、廿年的快速發展，大家都稱讚成嘉玲當校長時期，大刀闊斧的改革作風，但是如果當年不是老校長存了十幾億，她哪裡有豐富的資源進行改革？聘名師，建校舍、買圖書，添設備，樣樣都要花錢，我很敬佩成嘉玲董事長治校整頓的決心與魄力，但是學校如果沒有資產，要改革談何容易，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嘛！過去文化大學一度連鐘點費都發不出來，後來靠城區部，也就是推廣教育中心賺錢，不然文化大學幾乎都辦不下去了。有人說，成嘉玲當校長的時候，拼命花錢，但她是很會花錢，為了學校的發展，花錢是對的，不花錢世新怎麼能由專科改學院？學院改大學？開設碩士班，再開博士班，這些年來一直是教育部追求卓越計畫的重點大學。很多世新校友談起來，大家都很感謝成嘉玲把世新辦得有聲有色，讓校友們也與有榮焉，當然因為老校長積存了這麼多錢，讓成董事長能推動改革大計，這點我們不得不感念創校的老校長。